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

# 隋唐五代教育論著選

周谷城題



孫培青 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

隋 唐 五 代 教 育 論 著 選

孫培青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  
**隋唐五代教育論著選**

孫培青 編

叢書責任編輯 呂達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發行  
新華書店總店科技發行所經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廠印裝

\*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2.75 字數 500,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730

平裝本 ISBN 7-107-10842-5/G·2372 定價 11.05 元  
精裝本 ISBN 7-107-10843-3/G·2373 定價 14.50 元

##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前言

為了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在一九八三年十月舉行的首次會議上，決定整理出版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并於一九八四年三月組成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負責組織整理和編輯本叢書的工作。

中國教育源遠流長，有關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教學經驗等方面的論著及散見於各種典籍中的教育文獻頗為豐富，是世界教育科學中的一份寶貴財富。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取精用宏，搜集上起金文甲骨，下至清朝末年各種典籍中的教育文獻資料，包括教育理論、教育制度、科舉、書院等。各種政治傾向、不同學派和觀點的文獻資料，凡是確有教育史料價值的，均將廣泛搜集，有選擇地收編。編輯時，根據文獻性質和教學科研的要求，分別採用選編、輯佚、標點、校勘等形式，必要時酌加注釋，以分卷形式陸續出版。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由有關院校的專家學者共同完成，一些出版單位也給予寶貴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編纂這樣大規模的教育文獻叢書，在我國還是第一次，缺點和錯誤一定不少，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五月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顧

問：熊承滌

楊榮春

主任委員：王炳照

副主任委員：李國鈞 尹德新

孫培青 呂達

委

員：（以姓氏筆劃為序，注\*者為常務）

\*王彬 \*王炳照 \*尹德新

\*呂達 \*李國鈞 吳宣德

邵祖德 高時良 馬秋帆

\*孫培青 喻岳衡 趙家驥

秘

書：王彬（兼）

##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說明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是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中的一類叢書。編纂本叢書的目的是：為了搜集、整理和保存我國古代教育論著，以便研究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理論和措施，發展和繁榮我國的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為了批判地繼承我國的教育文化遺產，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為了充實師範院校教育學科師生的教育讀物，提高該科教學的理論水平；為了使讀者了解我國源遠流長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增強民族自信心，培養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情操；為了給國外教育學界提供中國古代教育一種系統的研究文獻。

編纂本叢書的指導原則是遵循馬克思主義思想，實事求是，廣泛搜集文獻，認真選材，做到「取精用宏」。

編入本叢書的內容，有歷代教育家的教育論著，也有歷代封建帝王、思想家、政治家、政論家、文學家、科學家等人有關教育的文告和論著，以期能夠如實地、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我國古代教育理論的水平。範圍大致如下：一、反映當時的教育學術水平，對當時和後代教育影響很大的。二、有一定教育理論水平，對當時和後代教育影響較大的；三、對當時和後代教育雖無大的影響，但是確有獨到見解的；四、總結當時教育經驗，反映當時的實際教育情況的；五、對當時教育（包括科舉）的意見、建議和批評等；六、哲

學方面人性論、認識論、道德論等與教育、教學原理有關的論著。

論著叢書按朝代編纂成冊，計有以下十卷：

先秦教育論著選；

秦漢教育論著選；

魏晉南北朝教育論著選；

隋唐五代教育論著選；

北宋教育論著選；

南宋教育論著選；

遼金元教育論著選；

明代教育論著選；

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

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

每卷根據教育文獻的多少，分別編成一冊或幾冊。每卷都有編者的話，介紹該卷的大致內容與編選情況。

這些教育論著絕大部分是屬於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也有屬於奴隸制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它們所反映的教育思想，必然打上時代的、社會的、階級的烙印。對其中的內容，編者未加評論。讀

者在閱讀和運用本叢書的文獻時，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剖析，以便去粗取精，古為今用。

本叢書的編纂工作，得到各有關單位和同志們的關心和協助；各卷的主編和編輯同志為組織和參加這一工作，付出了辛勤勞動；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葉立群同志積極支持和促成本叢書的出版，該社有關部門的同志如呂達同志等認真做好本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對此，我們一并表示謝忱。

著名歷史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周谷城副委員長為本叢書各卷題寫書名，謹致衷心的感謝。

本叢書采用了解放前後整理出版的古籍版本，對這些古籍整理者和出版單位表示謝意。

由於編者的水平所限，以及其他原因，叢書的編選工作，一定有不妥和失誤之處，敬請讀者予以指正！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五月

## 編輯體例

一 我國古代教育論著往往跟其他論著混在一起，需要加以抉擇取舍。因此，選材時，如果全文涉及教育的就選了全文，如果只有一段講教育，盡量選自然段，一般不作語錄式的摘選。如有刪節，不用刪節號，中間空一行來表明。

二 教育論著跟其他論著有聯系的，如倫理教育與倫理學、審美教育與美學、音樂教育與音樂理論等，這些方面涉及教育的就選，不涉及教育的不選。

三 有些著作，經後人考證，對作者確有疑問。但是這些書也反映了當時或稍後的教育情況和思想，還是入選（如孔叢子），只列出書名，不寫作者，在書的簡介裏說明。次序按論著內容或成書的時代排列。

四 論著按朝代劃分，但論著作者為後代人，所著前代正史中論述教育的文字，收入前代的論著選。如范曄著後漢書儒林傳，收入秦漢教育論著選，而不收入魏晉南北朝教育論著選。如果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一般著作中論述前代教育的，如馬端臨在文獻通考、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論述前代教育的論著，仍編入

他們所生活的朝代的論著選。

五 論著一般以作者生年為序，生年不詳，參照卒年，生卒年都不詳，參照其活動的時間。如果作者的生年在某帝王的生年之前，但是他的教育論著寫作在這帝王在位的時期，排列順序適當加以調整。

六 原文有篇目的用原篇目；沒有篇目的根據原書敘述或內容擬篇目。

七 原則上按原書的字排印，避諱字（包括缺筆字）改正。有些地方有脫誤或衍文，仿照史記標點本點校體例，參考有關文獻，認為應刪的刪去，但保留原字，加個圓括弧，用小一號字排，認為應加上的加上，加個方括弧，以便識別。

八 標點符號照一般用法。引文加單引號：「……」，引文中還有引文的加雙引號：「……」。書名、篇名用書名線～～～；人名、地名、朝代名等用專名線——。

九 為了使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在每人論著前面寫作者簡介。有些論著用書名，如鹽鐵論、白虎通等，寫書的簡介，并介紹書的編者。

十 秦以前論著酌量采用古注。秦漢以後的論著一般不加注釋。根據最新整理過的標點本（如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漢書等）排印的，不加校注。如果根據以前的其他版本排印，文字出入較大的酌加校注。文中用注釋或校注的一律采用篇後注。

十一 文獻出處在論著後注明。第一次出現，寫作者、書名、卷數、篇名、出版單位和出版時間，例如：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以後引自同樣的書，就不再詳細列舉了，例如：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如果是前人輯佚的論著（如嚴可均輯佚的文獻），除了照原書注明原來的出處外，還寫明錄自何書。

十二 論著如果只選用一段或幾段，寫明「節選」。一本書的各篇如果都是選用的，在書名下寫「節選」；如果有些篇全用，有些篇選用，在篇名下寫「節選」。

## 本卷編者的話

隋、唐、五代（五八一——九六〇），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教育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許多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對教育的有關問題都有所論述，但文獻材料頗為分散，查找實在不易。隋唐五代教育論著選取這個時期三百八十年間較有重要意義的教育論著，原則上按人物年代的先後，加以編列，從多方面反映這個時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實際的發展和變化。

隋朝是六世紀下半葉由楊堅建立的，它是統一南北、結束分裂局面的中央集權國家。隋王朝的統治較為短暫，只持續了三十多年，在一些教育家、思想家推動下，雖制定了興學的教育政策，可是並未認真貫徹。教育事業曾有初步發展，但由於最高統治者思想的搖擺，政局的動蕩，中途遭受挫折，出現大起大落的情況。從歷史發展的過程考察，隋代創設的一些制度，為唐代教育發展開闢了道路，它制定的興學的教育方針，設置學校，納羅人才，整頓文風，推行禮樂教化，重視圖書建設等等，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唐朝繼隋朝而起，吸收隋的歷史經驗教訓，實行隋已開創的一些有效的制度，走上繁榮強盛的道路，統治的時間長達二百九十年。唐初李淵就強調要興化崇儒。李世民在「偃武修文」的思想指導下，於貞觀

初就開始實行崇儒興學的方針政策，採取一系列實際措施，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學教育制度，使教育事業有很大的發展。到了李隆基當政的開元年代，不僅官學受到政府的重視，而且私學的開辦也受到政府鼓勵，並且通過教育立法，使學校內部建立起較完備的教學制度。廣泛發展的教育事業和豐富的教育實踐活動，是教育思想發展、教育論著產生的現實基礎，所以唐代教育論著不僅絢麗多彩，而且數量也有較大的增長，自然成為本書的主體部分。

五代延續五十多年，在分裂割據的特定政治條件下，各地方政權維持短期的安定，使地區經濟和教育事業也有所發展。由於戰爭的破壞，造成學校的不足，但民間書院的興起，彌補了學校的不足，這是五代教育的特點。印板術的使用，使經書廣泛傳播，也為教學創造了有利條件。但這一時期在教育理論方面則創新不多。

以下着重就唐代教育論著中的有關問題作一些說明。

關於崇儒的教育方針政策。這是這一歷史階段教育論著中重要的特點。唐王朝建立後，為了它的長遠統治利益，在政治上、經濟上暫時對人民作了一些讓步，但在思想上則設法加強控制。儒學、佛教、道教成為控制人民思想的三件法寶，被唐朝統治者分別加以利用。其中與政治倫理道德密切結合，在社會生活中經常發揮作用的是儒學。傳統的儒學因為主張貴賤等級制度、忠孝仁義的封建倫理道德，採用禮樂教化移風易俗的感化手段，仍然適合帝王統治需要，成為官方學術。唐初就宣揚崇儒的理論，武德二年（六一九）曾強調興化崇儒，頒發了詔書，貞觀年代繼續提倡。其實際措施就是用行政命令為儒家創始人

孔丘立廟，規定定期祭孔的制度，并將儒家經典列為學校正式課程，通過學校教學渠道，把儒家思想灌輸給年輕生徒，鼓勵勤讀經書的儒生，為他們提供參政當官的機會。論著中有不少議論崇儒、尊孔、讀經、任賢的文獻，就是這種思潮的反映。

關於提倡道教、大量設置玄學。這是唐代教育政策中的新特色。李淵開其端，認道教始祖李耳為先祖，立廟奉祀，提高道教的地位。李治進一步對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李隆基推動尊崇道教達到高潮，命令京都及各州皆立玄元皇帝廟，士庶每家藏老子一本，勤加習讀，貢舉加試老子，還命令將崇玄學與玄元皇帝廟並設，規定博士與學生皆有定額，學習道教的五經（老子稱道德真經、莊子稱南華真經、文子稱通玄真經、列子稱冲虛真經、庚桑子稱洞虛真經），其考試如國學，科舉增設道舉，為玄學生入仕參政開辟了道路。唐代依照行政命令設立的崇玄學達數百所之多，其教學有完備的制度。這種奇特現象，是南朝的玄學所無法比擬的，後代再也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關於人性論的討論。人性論是教育理論的基礎，在唐代是被重視討論的問題之一。一些思想家為了論證統治者特權地位，選擇合乎他們利益的人性理論，批評性善論、性惡論、性善惡混論等都屬於一偏之見，而繼承孔丘「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觀點，發展成性三品說。韓愈是這種學說的主要代表，他與過去思想家不同的是把性與情聯繫起來，以情的表現來說明性，認定情的品級和性的品級是相應的，肯定教育在發展和完善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李翱與韓愈的觀點有差別，他受佛學的影響，主張性善情惡，認為性本質總是善的，而情欲都是惡的，情影響了性，使它受蒙蔽或破壞，因此教育的

任務就是滅情復性。皇甫湜同於韓愈的性三品說，但偏向性善論，強調自覺勉勵。後來的杜牧，則抨擊性善論、性善惡混論，而偏向性惡論，強調要有禮法來制約人的性惡。這兩位，在人性論上都缺乏新見解。

關於培養人才的標準。李世民對選用官吏，強調以德行學識為本，德行居於首位，學識其次。這也就成為培養人才的標準，這種人才要知道儒家以德治國的理論，遵循三綱五常的規範，能通達社會事務，經世致用，最好還要文武兼備。

關於倫理道德教育。統治者提倡忠君孝親，規定孝經是學校必讀的教材。李隆基還親注孝經，頒發學校，作為標準教材。思想家肯定五常是社會道德規範，其中最基本的規範是仁與義，其他一切規範則是仁義在各方面的實際表現。所謂自古以來永存不變的道，就是仁義而已。仁義存於内心，而表現於行為。在對待人我關係上，體現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精神，責己重而周，責人輕而約。個人的修養與師友的影響密切相關，要審慎地選擇善友，建立牢固的聯系，在進德修業上會獲益不淺。要有道德是非觀念，不能只計個人的利害而不顧是非，應該從道，而不是從眾。處世之中，要堅持道德原則，實行時要從具體情況出發，適當注意靈活性，這就是內可以守其道，外可以行其道。

關於統一教學內容、統一教材。由於唐代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體制的確立，要求居統治地位的儒學思想也相應地統一。當時南北不同門派，傳播不同的注疏，體現不同的經學理論，學校教學難有統一標準，考試取士也無共同標準，這對統一思想是有妨礙的。李世民為了統一儒學思想，先令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統一了經書文字，以後又令孔穎達負責組織一批經學家，研究漢以下的注疏，進行統一解釋，成書

後，又經過兩次修訂，最終編成一百七十卷的五經正義。這部官書頒發之後，成為國家規定的統一教材，也是科舉考試的依據。統治者認為經學教材統一十分重要，因年久經文發生誤差，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統一諸經文字工作。大曆年間張參奉命校勘五經文字，開成年間采納鄭覃建議，創立石經，都是這種思想的實際表現。經學統一，束縛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引起有識之士的不滿，他們突破官定注疏的束縛，憑己意說經，發表異議，闡發自己的政治見解。這種捨注疏甚至捨傳記而求經的做法，造成學風的轉變。啖助及其弟子趙匡、陸質，就是開新風氣的先鋒，支持者大有人在。

關於文化科技繁榮與教育的發展。唐代國家統一，並有較長時間的社會安定，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促進經濟的繁榮，國際間交流的開展，歷史文化遺產的積累，為文化科學的發達創設了條件。在文化方面，唐代文學的主要文體近體詩和散文極為興盛，取得輝煌成就，士人沒有不會詩文的。官學私學都教授文學，學習文學和文學寫作的方法，有不少人加以研究，此類論著頗多。唐代重視歷史研究，強調史書編纂，組織編撰多部史書，還有個人編寫的重要史學著作，史學理論有了新的總結，史學傳受也較普遍。藝術方面，書法頗受重視，學習繼承二王書體，創造唐代新書體，先後出現許多書家，總結書法教學的許多經驗，寫下不少論著，成為寶貴的遺產。科學方面，唐代重視數學，王孝通著緝古算經，李淳風注釋十部算經，是數學的重要發展，也為數學教學提供了條件。地理學研究也有較大的發展，適應內外交通發展的需要，編成多種地志地圖，地理學家賈耽所著的海內華夷圖等，在繪制方法上有創新，都推進地理教學。醫學科學也有較大發展，備急千金林方、外臺祕要是集當時醫學大成的兩部名著，唐新本草是一部收集